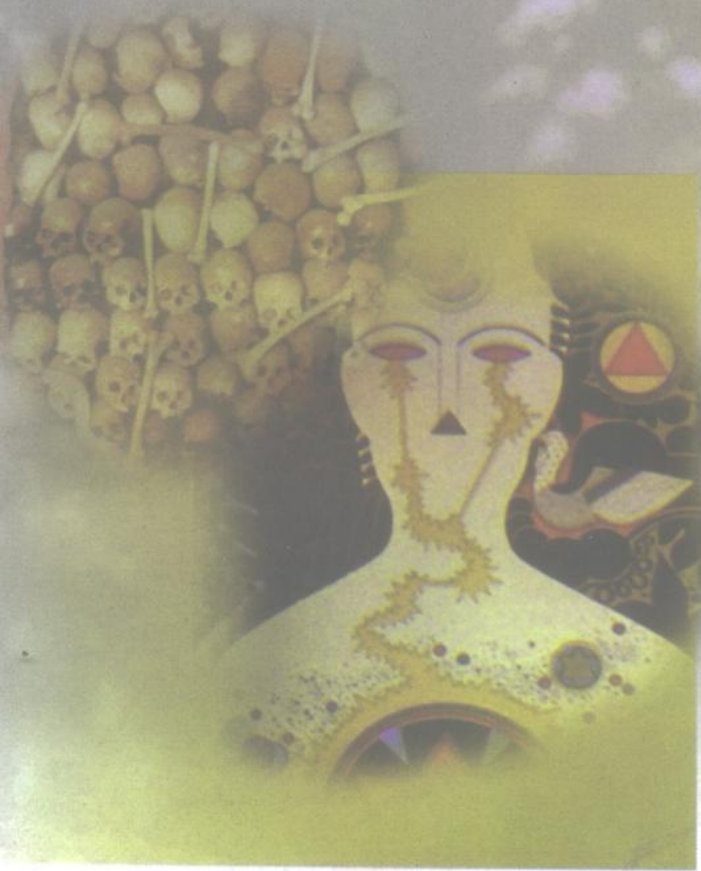


近代
中国社会史料丛书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上卷

《文史精华》编辑部 编

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主编 李秉新 徐俊元 石玉新
编辑 杨小波 谢凤英 靳迎春
杜丽英

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上下卷)
《文史精华》编辑部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44号)

石家庄市东兴制版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40.375印张 1,000,000字 1997年4月第1版

199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定价:60.00元

ISBN 7-202-02041-6/K·532

前 言

《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是从全国各地各级文史资料中集选的独具特色的大型史料丛书,1992年曾出版2部,为《近代中国土匪实录》(3卷150万字)、《近代中国帮会内幕》(2卷100万字);现又推出3部,为《近代中国烟毒写真》、《近代中国大案纪实》、《近代中国江湖秘闻》,均为2卷100万字。这样,这套书便有5部11卷共550万字与读者见面了。

人民政协的文史资料是我国独有的、特色鲜明的一个史料学门类,是中国乃至世界史坛上的奇葩。她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以实事求是、存真求实为宗旨,由社会各界阅历丰富的人士将其大半生中亲身经历、亲见、亲闻的可以存史的事件、人物、事物等记述下来,以补史续典、昭古示今,借鉴教化,资政育人,有益当代,惠及后世,具有珍贵恒久的史料价值和彰著深远的社会功效。社会史料作为文史资料的一个类别,因其相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类别数量鲜少而尤显奇珍难得。本书编辑人员穷数年之功,集全国同类史料之精华,再从中撷珍择粹,推出蔚为大观的《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以飨广大文史爱好者和社会各界读者。

近代中国,在本书中特指自上世纪末至本世纪中叶、即从晚清戊戌变法到新中国建立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这里有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的原因。从形式上看,本书选收的文章绝大部分为全国各地政协组织提供的文史资料,这50年正是文史资料工作征集时限;更主要的在于内容,50年间,中国社会一直处在剧烈的动荡变化之中,外强屡犯,内乱不断,兵连祸结,灾难深重,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以至土匪猖獗,帮会肆虐,烟毒弥漫,娼妓遍布,大案迭起,江

EA35/08

湖可怖，其状其情于国史中甚为鲜见，因之留给我们今天的史料，便确有集编实录之必要。

本部《近代中国烟毒写真》共选编了 157 篇史料，大体按地区排列，上卷除一篇综合性概述外，包括京沪津三市，华北、东北、华东、中南地区；下卷包括西南、西北地区；其中旧中国烟害毒祸最为惨烈的西南地区川黔滇三省的史料尤为丰富，而其他地区亦谓集此类史料之大成，为迄今各类出版物中所仅见。统览全书，真实、全面、详尽、生动地记述了自 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列强野蛮入侵，强迫腐朽的清朝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大肆运销烟毒，攫取暴利，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记述了从晚清到民国，无论是大大小小的军阀还是国民党政府，无不视烟毒的种植和贩卖为其招兵买马、扩充地盘、广开财源、争权夺势的主要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记述了日本侵略者及其扶植的傀儡政府公开制造营销烟毒，肆行无忌地为其侵略战争和汉奸勾当服务。记述了旧中国不同时期的各类政权，一方面纵容支持烟毒流布，甚至搞“公卖”，另一方面又作戏“禁烟禁毒”，但往往是越禁越多，使整个社会乌烟瘴气，放目是烟枪烟鬼，到处是家破人亡。更记述了新中国成立后，雷厉风行地禁烟禁毒，拯救烟民，一举割除旧社会遗留的毒瘤，百年烟害一朝尽扫，得到亿万人民的衷心拥戴，体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伟大真理！

近现代史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信广大读者能通过本书加深对外国列强侵略者给中华民族造成的深重的苦难，对旧中国反动政权和黑暗社会，对为害国家、遗患民族、作祸人民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烟毒的了解和认识，从而更加热爱我们伟大的党，热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祖国，热爱我们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新社会。这正是我们编辑此书目的之所在。

《文史精华》编辑部

目 录

旧中国烟毒概述·····	吴 雨 梁立成 王道智 (1)
旧北京的烟害·····	陶广仁 (67)
旧上海的烟毒·····	平襟亚 (76)
抗战前的上海鸦片业·····	高洪兴 (85)
鸦片流毒在中国和上海·····	洪荆山 (96)
上海的鸦片贸易与流毒 ·····	黄 韦 戴鞍钢 (100)
蒋桂上海鸦片争风案 ·····	陆茂清 (110)
专为毒品保险的“三鑫公司” ·····	杨展成 (116)
潮州帮在上海贩毒略述 ·····	李修章 (123)
鸦片大贩子叶清和 ·····	佚 文 (127)
抗战后的上海禁烟 ·····	刘光清 (146)
日伪时期天津烟毒及税收 ·····	孙慎言 (153)
日军包庇下天津制毒内幕 ·····	王 龙 (160)
日伪在热河制造的烟害 ·····	田果如 (165)
鸦片对山西人民的毒害 ·····	武直刚 (174)
解放前太原制毒见闻 ·····	胡敬斋 (178)
日寇毒化大同人民的罪行 ·····	王振三 (183)
从黄花菜到罂粟花 ·····	张新平 (186)
日伪时期鸦片在应县的泛滥 ·····	葛如兰 (194)
旧社会河套地区鸦片烟害 ·····	苏希贤 (198)
五原烟毒史话 ·····	李子英 (209)
临河戒烟所始末 ·····	王廷英 (214)

鸦片烟毒在赤峰	李心平 王洪武	(218)
四亩大烟害死一条人命	张金祥	(227)
日寇用毒品残害抚顺人民的罪行	方 觉 姚云鹏	(229)
杀人不见血的吗啡馆	张忠贵等	(234)
大烟馆素描	姚云鹏等	(237)
“大桥旅馆”的烟鬼	姚云鹏等	(239)
伪满时期辑安县的社会毒瘤	王殿令	(241)
伪满贩卖和吸食鸦片烟见闻	张春园	(244)
伪满时期的“康生院”和鸦片小卖所	陈 冀	(250)
李寿山与敦化烟馆	李盛芳	(253)
解放前的讷河烟馆	李振文	(262)
东丰烟毒及禁烟事略	武 起	(265)
嘉荫鄂伦春人的禁烟	顾 曾	(274)
威海卫的烟毒泛滥和禁烟措施	毕玉泮等	(281)
济宁的鸦片公卖与改造烟民	远 敬	(286)
烟榻絮语	袁静波	(289)
旧社会鸦片流毒见闻	吴天铎	(295)
鸦片在亳县的流行和危害	张荫庭	(300)
陈调元在安庆“禁烟”侧记	徐锦文	(305)
镇江鸦片烟土贩卖史话	杨方益	(314)
烟毒弥漫的旧无锡	计锡林	(332)
解放前宿迁烟毒和禁烟政策	张荣轩	(342)
鸦片烟在新浦	巽 之	(346)
害人非浅的“福寿膏”和“白面”	王恩洽	(355)
昆山旧时鸦片之害	丁绍林	(359)
吸毒巨祸的泛滥和消灭	程海容	(364)

浙江的“湖州帮”与“禁烟局”	朱剑芒 (367)
昙花一现的浙沪禁烟公署	韩承瑜 (381)
扬州禁烟闹剧	杨梦麟 (384)
鸦片害了南通单麻子桥人	徐达文 (386)
日寇毒化南通的罪恶	管劲丞 (389)
回忆宜兴戒烟医院	钱挹青 (392)
回忆曲塘联抗戒毒所	陈济民 (394)
建国初金沙镇戒烟所追记	邱晓馨 (397)
辛亥革命后浙省“拒土禁种”忆往	朱竺峰 (401)
浙江旧时的禁烟情况	沈松林 (404)
吴望伋东阳禁烟毒	郭佐唐 (407)
衢县禁烟禁毒始末	廖元中 (414)
解放前温州的鸦片流毒	戴文席 (421)
姚北农民捣毁鸦片捐局经过	徐顺潮 (429)
查封蒋介石的啡啡工厂一案真相	彭善后 (432)
近代江西禁烟散记	涂苏中 (436)
赣州禁烟记	徐浩然 (446)
厦门的鸦片流毒	姚自强 (452)
肆虐百年的漳州鸦片烟毒	黄叶沱 (460)
晋江禁毒记	许良晓 (471)
旧洛阳烟毒及“贩毒大王”孙殿英	毛汝采 (477)
修武烟害及禁烟斗争	李晓飞 (483)
漯河的禁烟禁毒	邢富功 刘国钧 (486)
旧社会的鸦片流毒及其戒烟工作	陶济安 (490)
鸦片在鄂西的泛滥	袁简之 (497)
旧社会鸦片烟业在汉口	田梅村 (504)
旧时武汉烟毒	吴楚卿 (509)

宜昌鸦片市场简述	冯锦卿	(514)
宜昌陈家鸦片烟馆旧事	陈鸿儒	(519)
武汉“烟土大王”赵典之	赵舜琴	(527)
北洋军阀在施鹤的禁烟黑幕	李树荪	(539)
日伪武汉戒烟局黑幕种种	夏国尧 黄少吟	(544)
何键主湘时期的“特税”概况	傅益光	(551)
闲话辰溪鸦片	刘明裕	(564)
新桂系与鸦片烟	黄绍竑	(570)
广西百色的烟帮	岑建英	(590)
三十年代的梧州鸦片批发商	招荫庭 范子溪	(595)
梧州鸦片烟土行业史	招荫庭 范子溪	(599)
我主办的广西“禁烟”	陈 雄	(611)
西隆、西林烟案内幕	陈良佐	(619)
广州湾专营鸦片的三有公司	蔡进光	(623)
潮汕兴梅扫毒运动纪略	钟 浩	(630)

旧中国烟毒概述

吴 雨 梁立成 王道智

鸦片战争后的鸦片问题

人但知林则徐之前及林则徐生活的时代，鸦片问题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问题，而不知民国时代鸦片问题的严重性，比林则徐在世时犹有过之。

林则徐身后，鸦片问题为什么会严重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的呢？

印土、红土、海洛因

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在虎门当众销毁了英美烟贩交出的鸦片237万斤。销烟开始的日期6月3日，后被定为戒烟节。林则徐亲自配制的戒烟药丸，则被后人奉为戒烟妙药。

在林则徐逝世以后，鸦片问题仍然十分严重，不仅红土、清膏（均是鸦片）源源输入，而且国产烟土（也是鸦片的别名）充斥市场。林则徐生前所说关于鸦片流毒足以亡国灭种的话，促使爱国的人们深长思之。很多有识之士继续为禁烟而奔走呼号，抗争不息。

1904年成立的去毒社曾在福建做出了不少成绩，但在清末社会，要消弭百年烟祸，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进入民国以后，想不到情况更糟。民众要禁烟，官府要种烟。烟贩托庇于兵、匪，兵、匪加入了贩烟队伍。犹如江河之堤已溃，洪水不可阻挡，烟禁一开放，烟毒便泛滥、肆虐。

在旧中国纵毒的主要反动势力之一便是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利用在中国的租界特权和内河航行特权，将制毒、贩毒的机关布满中国。上海是他们公开推销鸦片的主要基地。

英国怡和洋行，垄断上海鸦片贸易，达 30 年之久。销售范围包括长江流域各区，销售总量，共计约 100 万箱（每箱 1000 两）。其后，沙逊洋行和哈同洋行，亦相继成为英国在上海销售鸦片的主要据点。

沙逊洋行利用贩卖鸦片赚来的巨款，在上海滩大搞地产投机，建立了巍峨宏壮的沙逊大厦（即今南京路和平大厦）。哈同洋行的老板本是沙逊洋行管仓，他在沙逊洋行服务期间，熟悉了鸦片贸易的门径，逐渐另起炉灶，成为与沙逊匹敌的巨商。哈同无子，晚年将产业转卖给沙逊洋行，价值 1700 万元。现上海静安寺路爱俪园，即当年哈同所建。

沙逊、哈同等洋行销售的，都是印土（印度鸦片），一般分两种：一种叫“大土”，潮州人称“公班”，每颗重 3 磅，用烟叶包裹，黄黑色，形状像足球，质地较软，质量上乘，供贵族、官僚吸用，民国初年每两价格高达光洋 3—4 元；另一种叫“小土”，潮州人称“加尔加答”（加尔各答的讹音，因产于印度加尔各答故得名），每颗重 1 磅，黄黑色，质地较大土坚硬，质量亦稍次，价钱最高时每两 2 元。沙逊、哈同两洋行在上海售出了多少鸦片，现无确切数字，但有一条资料是确凿的，在“洋药公所”（鸦片交易所，1885 年以后成立）开设后的大约 20 年间，沙逊、哈同两洋行通过洋药公所成交的鸦片达 40 万箱，平均每年 2 万箱（2000 万两）。

英国在上海独占鸦片市场，引起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垂涎和妒嫉。美、法、日联合抗议，并在报刊上揭发英国在上海租界公开贩卖鸦片，还告到国际禁毒会。英国不得不在上海英租界宣布禁烟。土行、烟馆随即将招牌全部收起，门口站岗保护的印度巡捕也撤走了，巡捕房还不时派出巡捕，进行突击搜查。似乎禁烟是认真的，成效是显著的。但这不过是演戏，是为了掩人耳目，是为了宣传的需

要。招牌收起，营业照旧，站岗巡捕撤去，便衣巡捕代之。突击搜查，事先都曾“知会”。英租界的华人探长王松涛还跟所有烟商串通起来，通同作弊。他跟他们讲定：作为探长，他不得不做点样子，装作雷厉风行，到处检查，逮捕烟贩，严惩不贷；作为烟商，要跟探长合演好这台双簧戏。于是，烟商们出钱收买一些流氓、无赖，让其怀藏烟土（假货或次品），故意藏头露尾，供巡捕当场抓获，解公廨（租界法院）审讯定罪，判处徒刑。烟商付给被捕的“烟犯”扮演者的酬金每日5角、6角不等。刑满释放之日，除付清酬金外，还发给奖品，有棉衣、单衣等。烟商们破费不了几文钱，便可照做烟土生意。租界当局则由此捞到了不少资本，可以在报纸上大做特做文章，说他们查缉工作如何如何有成绩。

对英国在上海公开贩卖鸦片提出强烈抗议的美、法、日帝国主义，其实也是穷凶极恶的贩毒者。当着上海英租界宣布禁烟，东印度公司的鸦片不便公开运进上海，英国在上海的鸦片贸易多少受到影响的时候，日本看准机会，从伊朗运来大批波斯鸦片。这种鸦片用红纸包裹，呈长方形，称为“红土”。每块重1镑，价格低于印土，但毒性比印土大，吸了会便血。红土在上海竞争不过印土，日本帝国主义者便大幅度降低红土价格，印土“公班”每两售三四元，红土仅售三四角。日人还到内地开辟市场，东北全部、华北一部的鸦片贸易，都被日人垄断。大连是他们贩卖鸦片的大本营。长江流域各省也是日本推销鸦片的范围。印土终于竞争不过红土，逐渐进入衰落阶段。

见到英、日在中国贩卖鸦片攫取了巨额钱财，法帝国主义红了眼，便以安南（越南）为基地，将鸦片转运至广州湾（湛江市）、香港、澳门、上海等地。1920年以后，原在上海英租界经营鸦片的潮州烟帮，因与英租界当局发生矛盾，转到了法租界，在宝裕里、升平里开设土行、土店数十家。上海贩毒中心逐渐从英租界转到法租界。法租界当局向潮州烟帮开办的土行土店征收的鸦片税，每月在12万

大洋以上。

在中国的鸦片市场上，美帝国主义是后来者。它却想出了一个“高招”，来跟把持中国鸦片市场的英、法、日帝国主义角逐，这就是制造和贩卖毒性更大、获利更多的吗啡和海洛因等毒品。吗啡是鸦片中的主要生物碱，鸦片中约含吗啡 10%。海洛因是吗啡的衍生物。这两种毒品，便于吸用，为烟民们、尤其是上层烟民所喜好。美帝国主义就是用它们打破了英、法、日对中国鸦片市场的垄断，并且“后来居上”。

日本帝国主义从美国制造吗啡、海洛因得到启发，用吗啡加糖精，制成“红丸”，推销于东北各地。大连是红丸制造中心，后运进上海，销售到长江流域。抗战时期，日伪占领区的红丸泛滥成灾。

洋大人调查禁烟

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清政府跟英国签定条约，规定禁运印土入华，中国亦自行禁止种烟。以 10 年为期递减禁绝，期满由中英两国派员联合调查。如在中国境内发现烟苗，则中国须赔偿英国在禁运鸦片期间所受损失。

条约签订以后，清政府下令全国禁种鸦片。云南、贵州土质适于种植罂粟，是中国鸦片主要产区。一纸令下，贵州除了交通要道两旁一里左右未种以外，其余地区照种不误。10 年很快到期，北洋政府为履行上述条约，于 10 年期满的前一年，即 1916 年，特令云、贵二省妥拟办法，厉行禁烟，加紧检查清铲，以应付英国派员会勘。两省当局规定，两省所属地区，如会勘时发现一株烟苗，种烟者处以枪决，主管之团乡董及县知事亦均处以枪决。正在两省加紧准备时，英国政府派定驻中国汉口领事赛尔慈为云贵两省会勘专使。

1917 年初，贵州省省长刘显世特调精通英语的三名县知事为禁烟专员，他们是炉山县知事沈仲堪、平舟县知事陈昭令、湄潭县知事陈时济。省府调取各县特产珍品，多方寻觅、高价收购白狼皮

两张，还特制赤金餐具，以便招待和馈赠即将到来的窦尔慈。不仅如此，省府还通令各县知事，搜罗民间珍藏古物及境内著名特产，待英国专使进入县境，即予奉赠。镇宁县知事接到命令，把民间所藏的诸葛铜鼓找了出来，以备到时献给英使。

英国专使窦尔慈在中国多年，对内地情况较为熟悉。他被委为专使后，立即委托在贵州的英法籍传教士秘密调查贵州禁烟情况。得到传教士的详细报告后，窦尔慈便于2月启程，经重庆抵贵州松坎。贵州省长刘显世指定的三名专员及招待员王恩锡已恭候多时。窦尔慈一到，王恩锡即献上礼品，专员沈仲堪还凑上去为窦尔慈擦火点烟。

刘显世很清楚，烟苗被清铲的，只是大道两旁狭窄地区，全省广大地区，处处都是绿油油的烟苗。为防英使离开大道，闯入烟区，刘显世特命在大道两旁的叉路口驻扎军警。如英使要转到小路，军警即报：“前面有匪（实即烟苗），正在清剿，暂请勿往。”为使窦尔慈相信，小路两旁也没有烟苗，贵州的专员命乡董、壮丁火速找出几条两旁没有种上烟苗，或突击铲去烟苗的小道，陪窦尔慈前往会勘。其实贵州省的种烟情况是瞒不过窦尔慈的，只是因为贵州省府及各县对他侍候得好，他才给予面子，专拣大道而行。跑了些地方，便夸奖道：“过去这些地方烟锅陈列，烟雾迷人，今天到来，不再嗅到烟气了。”又说烟土收割季节将近，还要去云南，就不及巡视贵州全省了。窦尔慈满载礼品，在贵州专员陈昭令等陪同下，取道安顺、兴义，去了云南。中英会勘贵州禁烟算是结束了。

帝国主义是中国烟祸的祸首，他们还要假惺惺地调查中国的禁烟。

军阀贩毒祸愈烈

进入民国以后，从表面上看，种植罂粟，贩卖和吸食鸦片，法律是一概禁止的，似乎鸦片在中国已经禁绝了。实际上，没钱的变着

法子在吸，有钱的堂而皇之地在吸。鸦片的来源不仅没有断绝，还十分富足。除了国内年年大批生产以外，帝国主义者还不断从国外运来。

更坏的是，各省军阀把鸦片的种植贩卖，当作主要的财源。军阀要争地盘，就要有人有枪；要扩充兵员，武装军队，保障给养，就要有大洋。而种贩鸦片，是攫取钱财的妙法。于是军阀们强迫人民种植罂粟，勒征苛税。

不但如此，军阀部队还公然参与制造和贩卖鸦片。

四川的大小军阀都从事贩毒，甚至用鸦片炼制吗啡。川军二十一军就设有“军实科”，由刘湘的舅子周成虎当科长，他勾结帮会，公然在军事机关制造吗啡原料“粗子”（坯子）。刘湘手下有个师长叫蓝文彬，也制造“粗子”。他身边有一名青帮大流氓叫刘颐章，专门为他在上海和长江沿岸码头私贩烟毒和军火。1931年在蓝文彬家中搜出“粗子”2万多两。

四川军人开了很多银行，除了极个别的，都做鸦片生意。如潘文华的重庆银行，唐式遵的建设银行，邓锡侯的通惠银行，刘文辉的济康银行，杨森、王缙绪的大川银行，黄庆云的商业银行，罗君通的益民银行，等等，也可以说是鸦片银行。

除了四川的军阀外，贵州的犹国材、王家烈，湖南的鲁涤平、何键等都大批贩毒。甘肃、宁夏的马福祥、马鸿逵，新疆的盛世才等，也不时将烟土东运。长江江面经常有军阀们的烟土船，一船烟土东下，一船枪械西上。当时割据一方、占山为王的军阀、兵痞，卷入贩烟活动之普遍，从广西柳州驻军也可见一斑。据1932年担任柳州禁烟局长的陈雄回忆：30年代初，驻扎柳州的第七军，从军长廖磊到下面的师长、团长，“无不明目张胆地私运、私售、包运、包销鸦片”。陈雄到柳州上任后，曾专门调查过军队私贩烟土的情况，“从各方面报来的情报中得知，廖磊、覃连芳（师长）、罗活（团长）以及好些军官的住宅，甚至军、师、团部里，无一处不藏有私烟。”

有的军阀部队往往不发军饷，而代之以烟土。军队开到哪里，就把烟土带到那里。如唐继尧的滇军进入广西时，就带着很多鸦片。即便是1915年入川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滇军，也以烟代饷。从1915年到1916年，随军陆续运进四川将近500驮的烟土，每驮两箱，每箱1000两，共计约100万两。

地方军阀贩卖鸦片敛钱，掌握了中央政权的军阀也想靠鸦片贩卖生财。1924年，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有的人于次年2月公然主张鸦片由临时政府“公卖”。据说提出的理由是：（1）中央财政困难，赖此可以筹款；（2）各省私贩鸦片，政府无法禁阻，不如明定官卖，寓禁于征。此项提案提交阁议后，遭到多数反对。中华民国拒毒会和上海各公团所组织的拒毒协会，先后警告段祺瑞政府，反对鸦片公卖。当时商务印书馆主办的影响很大的《东方杂志》，刊出愈之的《鸦片问题》一文，提出：“就现在情势而论，即使实行公卖，所得财源，各省势必截收，中央仍无所获，所以实际上有百害而无一利。……自日内瓦会议以后，我国禁烟有名无实，已为全世界所共知。此后如何实行禁绝，如何禁止军人私卖，都是有关于民族体面的大问题……”民国时期的鸦片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愈之指出的“军人私卖”，就在于各地军阀要靠贩卖鸦片攫取暴利，大发横财，扩充势力，就在于军阀政府支持鸦片贸易。民国烟祸甚于清代，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国民党“寓禁于征”

对鸦片“寓禁于征”，北洋军阀时期就开始这样做了。“寓禁于征”是个幌子，实际就是巧立名目，广征烟税。如种烟要按所种窝数征收“窝税”，不种则再罚交“懒税”，不管种与不种，都要上税，等等。从鸦片种植到炼制、运销、零售、吸食，每个环节都有税。这就使鸦片的生产、贸易、消费合法化。

国民党政府在1927年建立后不久，居然就效法北洋军阀，实

行了“寓禁于征”的禁烟政策。这就是在中央及各地设立禁烟查缉机关，其职责不是取缔一切种、贩、吸烟活动，而是负责征收鸦片税。只要是交纳鸦片税，种罂粟者可以自由地种，贩烟土者自可公开地贩，吸大烟者可自在地吸。据制定这个政策的人解释，鸦片的生产、贸易和消费，与其让它处于秘密状态，不如让它公开化。公开了，便于控制、限制、逐渐禁止。

据 1931 年 7 月 5 日《申报》报道，福建省设立了禁烟查缉处，马江船政局局长袁缙为处长。查缉处规定了全省各市县的鸦片税额，实行“招商承包”。此决定一宣布，前来接洽承包者，络绎不绝，大有户限为穿之概。其中福州、厦门两市均规定，每月税额 10 万元。但有些人仍认为是“绝好机会”，纷纷筹集资金准备承包。一时街谈巷议，都说鸦片要开禁了。

“寓禁于征”的政策公诸于众后，“举国惶惑”，既而舆论大哗。据 1931 年 7 月 3 日《申报》载，各地拒毒团体、民众团体及国民党很多地方党部都纷纷提出抗议，函电交驰，认为“寓禁于征”的政策是“饮鸩止渴”，是国家之耻辱，坚决要求制止设立禁烟查缉处，对鸦片实行“完全禁绝政策”。

1931 年 7 月 5 日，上海市商会通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措词颇为激烈：

近自禁烟查缉处设立，全国舆论，均以为实系变相之开放。盖禁烟扼要政策，即在禁种禁运。如果扬子江上游产土各省果能严令禁种，或堵塞来源，则吸者无从购求，不禁自绝。舆论均谓查缉其名，而官鬻其实……

上海市商会的通电进而指出：先总理中山先生说过，凡主张法律准许鸦片营业，或对贩卖鸦片之恶势力表示屈服，均为“民意之公敌”。这无异于说，国民党政府实行“寓禁于征”是违背了先总理遗训，是“民意之公敌”。

国民党政府为何冒天下之大不韪，实行“寓禁于征”呢？《申